史志琼崖

修缮后的万安书院大门。 本报记者 李豌 摄

重修中的万安书院一隅。 本报记者 李豌 摄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 李豌

万安书院
巷中隐匿的明代书院

“万安书院”位于万宁市万城镇旧城区，占地面积3亩多，其东临永福街，南向武澄街，西和州衙南门相邻，北通州衙朝阳门（东门），被民宅和商铺所环绕。从一条开着一家家茶店的巷道进去，施工现场一片蓝色工程围挡似乎隔开了居民区的喧嚣，围挡后，便是正在修缮的万安书院。

眼前正是一处整体偏红色的建筑，红砖砌墙，白水泥勾缝，正中暗红色的旧木门，门上木质匾额上，有四个红色隶体字“万安书院”。走进院中，已经完成修缮的建筑皆是统一风格，从窗户往里看，不同房间中尚未添置其他物品。从低矮的廊坊处，则可看到上面瓦片已有青苔。漫步其中，夏日的阳光洒在砖瓦上，耳边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。

不过，仔细看，红砖色彩并不均匀，也有磨损的痕迹。“修缮墙面使用的砖都是旧砖，一部分是从书院已倒塌房屋中清理出来的，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从附近村庄村民手中买来。”万安书院施工现场负责人钟壮望对海南日报记者介绍，按照先易后难和修旧如旧的原则，一期主要针对大门、中堂及东西两侧廊坊进行修缮。

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
知州茅一桂开创之举

翻阅地方志可知，万宁历史上只出现过一家书院，那就是刚刚完成一期修缮工程的万安书院，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（1573年—1620年）。

传世的康熙《万州志》和道光《万州志》都记载万安书院是由明代万历中期上任的知州茅一桂所创建，迄今400余年。

由于书院是建在宋代州学（即儒学、学宫，年月不可考）的旧址之上，后世有人误读文献，以为万安书院出现于宋代。

茅一桂当年创建万安书院之前，将万州学宫迁建于州署右边即西侧的广积仓，学宫左边便是牢狱，民间一些迷信风水邪说的人则传言“牢狱在左，于文运不利”，但很快流言就被事实“打脸”。

茅一桂，浙江归安人，万州史上的能吏之一，康熙《万州志》称他“才优学富，建学修署；折狱称平，征输不扰；为民上言，亡避忌讳；培补后山，创刊州志”。他对万州有不少创新之举，其中不但创建了万安书院，还创修了第一部《万州志》，即万历《万州志》，只是现已不存。

清代多次重修
进士杨景山贡献良多

茅一桂创建万安书院之时，已进入明朝的晚期，虽为当地儒学教育有所推动，但终究难抵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颓势。因此，清代以前的万安书院，相关史料记载可谓少之又少。

今天，我们细读清代道光《万州志》中辑录的万州进士杨景山的《新建万安书院记》，大致可以窥见书院后来的发展和衍变。

“前州刺史江西应公买城西北卫官旧署，权改义学。未几，以倾圮告。继江左席公莅州，首勤课士，方卜地捐建，倏丁太夫人艰，奔丧旋里，又不果成。继此而作之者，不重有赖乎其人欤？岁癸酉，江左顾公以能调陵水、兼摄万安。甫下车，以兴利除害为已任，以乐育人才为先务。”

原来，清代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万安知州应上苑看到书院因年月久远而荒废，便集资重建。

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知州席绍葆倡仪扩建万安书院，但因回乡奔葬而未有结果。

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江苏常州人士顾芝任陵水知县的同时，兼任万安知州，目睹书院破败，感慨道：“书院不设，其何以造士？且教之不兴，政何由举？是亦守土者之急务也。”

于是，顾芝着手扩建书院，带头捐出廉俸200余两白银，万州贤达、乡绅纷纷慷慨解囊，捐献白银1300两，没有摊派到民众的头上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。

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正月，万安书院正式动工扩建。当时的举人杨景山（1721—1794，万城后朗村人）、岁贡吴文成、禀贡陈忠官被推举出来督理建造过程，很快，书院在当年年底便告竣工。

按杨景山的描述，扩建后的万安书院有前门、讲堂、后堂三进，左右两翼的横廊有二十余间，两廊外东西各构屋数间为爨（炉灶）舍，周遭还有垣墙防护。讲堂、学舍、规制俱备。

杨景山是扩建书院的主要督理者，自然对书院的历史和扩建过程比较了解。他在《新建万安书院记》中还记载了当时州人对书院扩建的反响：“工既竣，州人人而观者咸相惊喜，以为百年所未有也，俱欲颂公（顾芝）之功，伐石以进，属为记。”

清代乾隆年间，万州举人（后中进士）杨景山督理万安书院扩建工程。 本报记者 陈耿 翻拍

在杨景山笔下，顾芝对万州的贡献不仅在于新建书院方面，而且还发展商贸、农业和教育等多方面，使得“贾安于廛，农歌于野，士敏于学，又不仅书院之作，足广系人思也”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，即1763年，杨景山考中了进士，而他中举是在22年前的乾隆六年。进士登科后，杨景山被朝廷派到江西崇义当知县，任上重视教育和抚恤工作，故而深受士民爱戴，因此，他离任时，当地百姓纷纷为他送行。

杨景山平生不爱资财，不为子孙留产业，曾捐资修葺万州学宫和万安书院。他十分好学，到老都手不释卷。

坊间说杨景山是万安书院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大受益者，因为书院扩建后，他得以在里面继续深造，最终考中进士，功成名就之后，尤其是晚年回乡后，他在万安书院掌教，造福桑梓。

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知州李大根应坤士乡贤请求，改建万安书院讲堂为重楼，前祀文昌，后祀魁星像，负责执行这些事务的是万州举人杨士鼎，杨景山侄子。

据介绍，万安书院整个修缮工程共分两期，一期投资317万元，二期计划投资1000万元。第二期工程主要对前堂（讲学堂）、县衙旧址以及周边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提升，以彰显书院文化特色。

儋州举人陈京本劝学

■ 杨江波

人物春秋

陈京本，清代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举人，生于儋州峨蔓福花村。据民国《儋县志》记载，陈京本“贫苦力学，颖悟过人，乾隆甲午贤书，少时曾往黎方耕种”。陈京本年少时就酷爱读书，但家境贫寒，幼年失怙，他不得不外出耕田，以谋得糊口之粮。

陈京本聪颖过人，虽然长年累月躬耕数亩之田，但最终也能在乡试中名列前茅，可谓是一鸣惊人。如今，在福花村仍存有当年官府为陈京本中举而立的举人坊，在举人坊后有一块石碑，碑上刻有一个硕大的“才”字，应该是为了彰表主人的才华。“才”字的上方，刻有这样碑文：“学高北斗，琼国明珠，大清帝国乾隆赐，甲午中秋。”

据民间口耳相传，乾隆皇帝赏识陈京本的才华，因此给他赐字，而“学高北斗，琼国明珠”，是极高的赞誉。

陈京本身为举人，满腹诗书，但他并没有踏入仕途，因为在古代的志书中并没有他出仕的记录。

陈京本有副自勉联：“日月有心来对我，风雨无情莫管它。”这也似乎就是他人生的写照。

据民国《儋县志》的记载，陈京本晚年致力于教书育人，在乡下设塾教学，门生甚多，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前来求学，而最让后人称颂的，当是他的《劝学文》。陈京本的《劝学文》，曾影响了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儋州人，如今儋州地区的一些老人，仍记得此《劝学文》的经典词句，他们还时不时地能轻吟几句，劝导贪玩、厌学的孩子不畏贫苦勤学好问，如此才能精进不休。

陈京本的《劝学文》洋洋洒洒近千言，文中有言：“放开眼界，休迷色障索探花；防守意诚，莫进赌场求利器。读书自有真物色，绝世风流；功名即是大赢家，胜场利试……半盏膏油千滴汗，莫忘父母艰辛；一条微线万机声，当竭心肠珍惜……春风不老，何必坐让中原；化雨常新，定是时敷边邑。丘文庄之《衍义》，和五指以掀天；海忠介之奏章，映七星而指日。山川不改，人物岂殊……”陈京本劝人勤学，因为“读书自有真物色，绝世风流”；他劝人要体会父母的艰辛，因为“半盏膏油千滴汗”；他劝人努力进取，因为“春风不老，何必坐让中原”；他还以千古流芳的“海南双璧”丘文庄（即丘濬）、海忠介（即海瑞）为例，激励大家勤勉读书。

官府为陈京本立的“举人”牌坊。 陈祥勇 摄

《劝学文》行文通俗易懂，但不乏深刻教化意义，不禁让人想起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这些劝学、节俭的经典名句。

据了解，《劝学文》曾经在儋州地区广泛流传，海南解放初期甚至还有当地中小学校将《劝学文》当作乡土教材劝学范文，让学生背诵牢记，对勉励学子勤学、好学，一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

如今，在儋州还有关于陈京本的民歌传唱，唱词如下：“苦海无边着耐忍，京本小就失双亲。自古英才先受厄，京本先苦后成人。”陈京本的人生经历，正如这首民歌所唱，出身贫寒，刻苦向上，但只能默默忍耐，经过孜孜不倦地学习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最后取得了不俗的成就。

陈京本为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：“离故土以安居，莫谓小人怀土；望高山而仰止，须知仁者乐山。”此联正好表达了他洒脱、进取的精神。

史籍典录

身后清风

■ 张锦凯

常言说“盖棺定论”，即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，其口碑也往往是从他人闲谈的民意中找到答案的。后事，人生之大事，奢靡厚葬与俭朴薄葬足以证明死者生前的身份及地位，但也并非尽然。

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为官者，立身清白，要求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洁身自好，以至于亲人们给其操办后事时，依旧要留下一缕清风才能“盖棺定论”。名相魏征、包拯生前功勋卓著，朝野敬重，但他们的后事却格外俭朴、低调。魏征、包拯两府虽为达官显贵，却有生前不祈妄福、身后不受虚誉的清廉家风，这除了两位千古名臣自身大义凛然、一身正气外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都有一位知书达礼、夫唱妇随、节俭治家的贤内助。

公元643年，拥有经国治世之才的大唐功臣魏征病逝。魏征死了，失去了一面镜子的唐太宗李世民悲痛万分：“今魏徵殁，朕失一鉴矣！”为祭奠这位一身正气、功高盖世、不可多得的忠臣，李世民追授魏征为一品司空，并令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，又赐羽毛装饰的灵车及鼓乐队，准予魏征陪葬昭陵。如此荣宠，对这位一生唯大唐社稷为重而不屑置家产、甘居陋室的穷相国来说，似乎也并不为过。但魏征的夫人裴氏以魏征平生节俭，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，所需仪仗、器物太多，不符合魏征的志愿为由，婉拒了唐太宗厚葬魏征的圣意，而是改薄葬、用素车、限送葬人员、防止挥霍铺张。身后留清风，魏征用他那句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来为自己“盖棺定论”。

公元1062年，清正廉明、不畏权贵、为民做主的北宋枢密副使、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病逝。一时间，“京师吏民，莫不感伤；叹息之声，闻于衢路”，宋仁宗赵祯亲临吊唁慰问，并为其停朝一日。包拯的灵柩归葬在合肥祖辈的坟地后，族人议论尽快请人作墓志铭。因包拯生前政绩斐然，得君主信任，受百姓爱戴，自告奋勇为其撰写墓志铭者甚多。包拯夫人董氏深知官场上的阿谀奉承，经过反复权衡利弊，决定请与包拯有着共同品格的同僚、枢密副使吴奎为夫君作墓志铭，以求如实地叙述包拯其人其事，杜绝溢美的不实之词蛊惑后人。
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“身后清风”就是高尚者不带一点瑕疵的“盖棺定论”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留得声名万古香。

一场被拖赢的战争

■ 刘志杰

战国时期，匈奴在物资匮乏时经常入侵赵国北部边境而大肆掳掠，令赵国边境的百姓苦不堪言。为了对付这个纵马驰骋、来去自如的对手，赵孝成王派大将李牧前去驻守雁门郡（今山西代县一带）。李牧是赵国经历长平之战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将领，他想出对付匈奴的好办法就是一个字——“拖”。

李牧将自己变成了“后勤部长”，每天宰杀几头牛，分给军士们吃，设立了官方的农贸市场，向前来摆摊的百姓收取摊位费，以此供养军士。同时，他还下了一道死命令：遇到匈奴入侵时，所有人马要立即退入军营，并禁止和匈奴作战，否则立斩不赦。

靠如此“退缩”固守，让每次入侵的匈奴人都空手而归，数年间边境倒也平安无事。但是，李牧却因此成了胆小怯懦、贪生怕死的代名词。

迫于压力，赵孝成王只好将李牧撤职，另派一名能打仗的将领代替了他。这位将领非常有进取心，一旦遇到匈奴入侵便马上率兵出战，孰料匈奴兵强马壮，赵国的士卒根本不是对手。结果，每次交战后赵军都伤亡惨重，百姓也遭到了更严重的抢掠，后期边境上连正常的耕种、放牧几乎都难以维持。

无奈之下，赵孝成王只好再次请李牧出山。李牧端足架子同赵王谈条件：出山可以，但是仍要执行自己以前的御敌策略。朝廷同意后，他又回到雁门郡故技重施了数年之久，怯懦的样子不但让匈奴人嗤之以鼻，连手下的军士们都感觉丢尽了脸面。

可是，不出战不代表不备战。平时，李牧给军士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，以此激励他们训练骑射，提高战斗力。同时，李牧还安排人维护好烽火台，确保军情紧急时通讯联络，又选派大量探子查探匈奴动向，以便随时都能发出警报。

因此，每当匈奴入侵，那些烽火台很快便被次第点燃，匈奴的马虽快，但远远赶不上烽火传递的速度。百姓们看见烽火，马上拉家带口、牵牛赶羊地从田间、牧场撤出，躲进城寨，农贸市场的人也马上收摊就跑。兵强马壮的匈奴人有劲儿无处使，只能气得破口大骂，甚至捏起马粪蛋往城寨里扔来泄愤。

眼看时机已经成熟，李牧精选了一千三百辆战车，一万三千匹战马，五万名勇士，十万名弩兵，组织起来日夜训练。然后一反常态地让民众出城放羊、耕田、摆摊。匈奴见此后马上派侦察部队进行试探性掠夺，结果马上便得了手。听了汇报后，匈奴将领立即率领部队倾巢而出。而李牧已布下三面合围的军阵，截断匈奴的后路，又从两翼包抄，一举杀得匈奴人仰马翻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，灭襜褴，破东胡，降林胡，单于奔走。”

此后的十多年间，匈奴再也没敢逼近赵国的边境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